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腐败与地方政府治理

彭爽 张晓东*

摘要：本文从制度弱化的视角来探讨“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基于中国省级层面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自然资源与腐败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资源禀赋与腐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然资源通过引致腐败弱化地方政府的治理质量，阻碍了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分组回归后发现这一传导机制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尤为显著，而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资源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从政策层面来说，改革现有的产权制度，优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减少腐败行为并提高政府的治理质量，是破解“资源诅咒”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资源诅咒”；传导机制；腐败

一、引言

作为经济活动投入的物质源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或地区来说本应是一种福音，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事实却表明资源富足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自Auty(1993)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概念以来，其迅速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相较于“资源诅咒”存在性检验的研究，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无疑更具有政策意义。Frankel(2010)总结以往研究成果，指出“资源诅咒”的传导渠道主要有：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呈下降趋势、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荷兰病”、制度因素和政府治理问题等。国内关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因素，而较少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自然资源与地方政府治理质量及其他制度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文献亦不多见。笔者认为，一方面，政府治理质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制度作为“资源诅咒”的一种传导渠道理应受到更多重视。另一方面，近年来腐败问题备受关注，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反腐元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当年立案17.2万件，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6400多人，较2012年同期增长36.3%^①，说明我国逐步加大了反腐力度。

*彭爽，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77087201@qq.com；张晓东，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523003930@qq.com。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经济视角下的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编号：10YJC7902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矿产资源出口管制管理体制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5BGL153）、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中央纪委监察部：《“老虎”“苍蝇”一起打 十八大以来查办案件工作综述》，载 http://www.ccdi.gov.cn/xwt/201401/t20140110_31312.html。

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从制度弱化的视角探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 2003-2013 年的面板数据,以腐败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质量的一个代表性方面,对资源禀赋与腐败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考察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政府治理是否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从而阻碍地方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来规避或减轻“资源诅咒”效应,将有利于稀缺资源的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自然资源本身并不会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资源诅咒”的产生更多的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会降低政府治理水平。具体地,以腐败作为政府治理质量的一个代表性方面展开研究。最早的研究者是 Krueger (1974),他认为由于自然资源本身包含巨大的经济租金,容易滋生寻租和利益集团,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弱化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Leite 和 Weidmann (1999) 建立新古典无限期限增长模型阐述了自然资源、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了腐败程度依赖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Gylfason (2001)、Torvik (2002)、Pendegast 等 (2008) 的研究支持以上结论,认为燃料、矿产资源导致寻租和腐败,对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可以通过抑制腐败行为破解“资源诅咒”。Vicente (2010) 采用 DID 模型对 São Tomé 和 Príncipe 的案例分析也证实,这两个地区石油资源的发现导致了地区政府公共部门更多的腐败行为。Aslaksen (2010) 认为无论以石油开采还是矿产收入作为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丰裕的资源都会导致更多的腐败行为。Sala-I-Martin 和 Subramanian (2012) 对尼日利亚的案例分析表明,该国长期经济状况表现不佳的原因在于发现石油资源导致的政府机构无效,而不应归咎于“荷兰病”。此外,在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文献中,Treisman (2007) 考察了不同国家腐败水平的影响因素,以资源出口作为自变量之一,同样发现腐败与资源出口依赖相联系。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Isham 等 (2005) 将自然资源分为“点资源 (point resource)”和“散资源 (diffuse resource)”,横截面回归结果表明“点资源”与制度变量 (法律、政府效率、腐败、规章制度等) 存在负相关关系,“散资源”则没有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Alexeev 和 Conrad (2009) 对石油和矿产资源出口阻碍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优化的观点提出质疑,计量检验没有发现资源与经济增长以及制度变量负相关。Bhattacharyya 和 Hodler (2010) 指出,自然资源如何影响腐败取决于民主制度,博弈论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自然资源在民主制度相对欠缺的地方引起更多的腐败,在民主制度相对完善的地方则不会。Ades 和 Di Tella (1999) 以燃料和矿石出口作为自变量,采用 1980 年代的数据研究发现资源出口与腐败正相关,但采用 1990 年代的数据回归时没有发现这一结论。Serra (2004) 采用极端边界分析 (EBA) 方法考察腐败的决定因素,将自然资源禀赋作为自变量,发现当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制度的代理变量后,资源禀赋对腐败的影响消失了。

综上,国外学者对自然资源与腐败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指标、数据、方法各不相同,得到的结论不尽一致。国内对“资源诅咒”传导途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方面 (如产业政策、区位条件、人力资本积累、科技创新等),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为主,考察自然资源与地方政府治理质量及其他制度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文献尚不多见。部分文献在检验我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时,将制度作为传导因素之一进行

定性与定量分析,认为腐败是“资源诅咒”的间接传导机制(徐康宁、王剑,2006;徐康宁、邵军,2006;韦结余,2013;张菲菲等,2007;邵帅、齐中英,2008)。本文将对自然资源与腐败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以考察自然资源是否通过引致寻租和腐败弱化了地方政府治理,并进而导致“资源诅咒”现象。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 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现有国内文献中,无论是研究“资源诅咒”还是腐败问题,大多采用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然而方颖等(2011)指出,面板数据方法一般是通过差分后的数据进行再估计,实质是以自变量的变化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量,更适合考察造成因变量变化的短期因素。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确定自然资源丰裕是否通过引起腐败弱化地方政府治理从而导致“资源诅咒”,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省份之间的比较,以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来解释各地区的腐败水平,揭示的是资源与腐败之间稳定的长期关系。我们认为,采用横截面分析更符合实际需要。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横截面 OLS 方法进行分析,横向考察自然资源与腐败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同时配合面板数据个体效应模型及动态系统 GMM 计量方法纵向考察影响腐败行为的各项具体因素,并以此提出可能的反腐措施。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Corruption_{i,t} = \alpha_0 + \alpha_1 Resources_{i,t} + X_{i,t} \beta + u_{i,t}$$

其中, $Corruption$ 代表各地区腐败水平; $Resources$ 代表各地区资源禀赋; X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的矩阵,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并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我们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减小异方差并增加数据的平稳性,为了控制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和 t 检验都采取 HAC 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调整。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 腐败水平的度量

在一些跨国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主要借助国际组织构建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腐败水平,如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感知指数和行贿感知指数、国际商务组织公布的各国腐败程度指数等。然而,上述指标都是通过对所在地区居民的调查,根据其主观感知状况构建,缺乏客观性。为了提高数据信息的真实性,Fisman 和 Gatti(2002)、Glaeser 和 Saks(2006)等将被判腐败罪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州公务员数或全州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美国各州腐败水平的指标。国内学者吴一平和芮萌(2010)、周黎安和陶婧(2009)、范子英(2013)、聂辉华等(2014)等也都使用各地腐败立案数表示腐败程度。基于数据真实性与可得性的考虑,本文也采用这种衡量方法,以各地区职务犯罪^①案件数量来度量腐败程度。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检察年鉴》。

2. 自然资源状况的度量

目前在探讨“资源诅咒”的文献中,国内学者主要采取三种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资源水平:(1)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徐康宁、王剑,2006;胡援成、肖德勇,2007);(2)采掘业职工工资水平与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丁菊红等,

^①“职务犯罪”类型包括贪污贿赂犯罪,以及渎职侵权犯罪。

2007);(3)能源工业产值占各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邵帅、齐中英,2008)。方颖等(2011)指出以上三个指标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他们以各地区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我们认为采用各地区采掘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来衡量地区资源部门的规模大小更为准确,因此本文选择直接采用采掘业就业人员数量作为自然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①,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其他控制变量

为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防止存在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更加深入的考察影响腐败的各项具体因素,本文参考国内对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献(倪星、陈珊珊,2013;吴一平、芮萌,2010;公婷、吴木銮,2012;周黎安、陶婧,2009;等等),引入其他可能对腐败水平产生影响的变量。相关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1。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符号)	衡量方法	数据来源
因变量	腐败水平(<i>cases</i>)	职务犯罪案件(件)	《中国检察年鉴》
自变量	资源禀赋(<i>RL</i>)	采掘业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i>agdp</i>)	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元)	《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开放度(<i>open</i>)	地方进出口总额/地方GDP(%)	
	财政分权(<i>dec</i>)	地方财政净收入/地方财政总支出(%)	
	公务员工资(<i>wage</i>)	公职人员职工平均工资(元)	
	教育水平(<i>edu</i>)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调查人口总数(%)	
	民营化水平(<i>market</i>)	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公务员规模(<i>civil</i>)	公职人员总就业人数(万人)	

(三)初步统计性观察

在进行正式的计量实证检验之前,可以依据各地区腐败情况与资源禀赋,绘制散点图和拟合曲线,并报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对自然资源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与腐败的关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本文分别从总体层面和平均层面绘制资源禀赋与腐败的散点图及拟合曲线(如图1和图2)。可以发现,无论从总体层面,还是从2003-2013年的平均数据看,两种情况下,自然资源与腐败案件数量的拟合曲线都向右上方倾斜,即资源禀赋与腐败在直观上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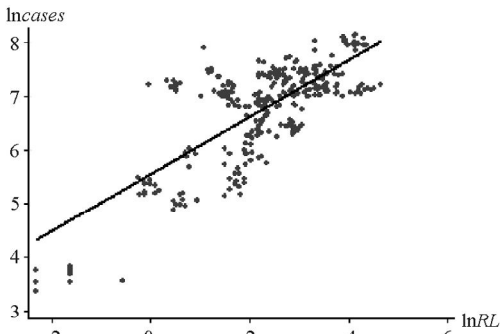


图1 总体数据拟合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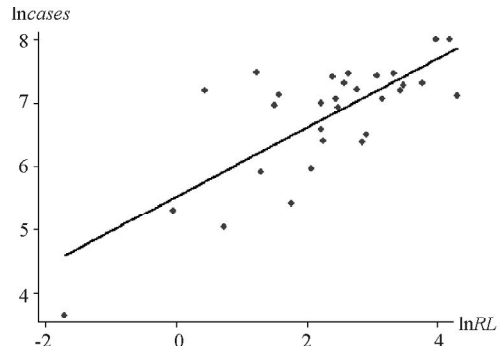


图2 平均数据拟合情况

^①我们也采用了采掘业从业人员与各地区总就业人员的相对数来衡量资源禀赋,研究的基本结论保持不变,因此可视作本文的稳健性检验。

表2报告了因变量、自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自然资源与腐败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资源部门规模每扩大1%将导致腐败行为增加0.7%。财政分权与腐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程度越高,腐败问题也越严重;公务员工资与腐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高薪养廉”理论;公务员规模与腐败案件数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这也符合常理。除此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不显著,有待进一步分析。

表2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	lncases	lnRL	lnagdp	lnopen	lndec	lnwage	lnedu	lnmarket	lncivil
lncases	1								
lnRL	0.7002*	1							
lnagdp	0.0135	-0.135	1						
lnopen	-0.0005	-0.3579*	0.5636*	1					
lndec	0.5703*	0.1786*	0.4856*	0.6558*	1				
lnwage	-0.2257*	-0.4301*	0.8296*	0.5193*	0.2549*	1			
lnedu	0.042	-0.044	0.7735*	0.5277*	0.5767*	0.5848*	1		
lnmarket	0.115	-0.2442*	0.7525*	0.6444*	0.5531*	0.6744*	0.4471*	1	
lncivil	0.8920*	0.6256*	0.126	0.0461	0.4769*	-0.0919	0.0452	0.143	1

注: *代表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高,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影响模型的估计效果,本文将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的方法。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lnagdp)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采用GMM方法将其作相应的内生化处理。

四、自然资源与腐败关系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本估计结果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采用OLS方法横向考察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表3中模型(1)、(2)、(3)利用各省份的平均数据,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可以发现,调整的 R^2 值逐步提高,关键变量资源禀赋的系数都显著为正^①,且最大的VIF值仅为4.81,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②,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自然资源越丰富,腐败水平也越高。这证明在中国省际层面,资源禀赋催生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腐败行为,自然资源通过导致腐败弱化地方政府治理进而产生了“资源诅咒”的观点是成立的。模型(4)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混合OLS分析,基本结论保持不变,而且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在以上4组回归中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工资、教育水平与腐败负相关,财政分权、民营化程度、公务员规模与腐败正相关。

①上海市因为资源部门的规模太小,作为离群值从样本中剔除。

②根据陈强(2010),VIF值越大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越严重,一个经验原则是最大的VIF值不超过10。参见:陈强,2010:《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24页。

表 3

OLS 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截面 OLS			面板 Pooled_OLS
资源禀赋	0.359*** (0.004)	0.404*** (0.003)	0.170** (0.036)	0.188*** (0.001)
经济发展水平	-0.819** (0.013)	-0.303 (0.363)	-0.253 (0.304)	-0.226 (0.349)
经济开放度	0.0443 (0.786)	-0.0254 (0.885)	-0.0689 (0.515)	-0.140** (0.046)
财政分权	1.290*** (0.001)	1.244*** (0.004)	0.628** (0.042)	0.592*** (0.009)
公务员工资		-0.232 (0.782)	-0.560 (0.284)	-0.142 (0.638)
教育水平		-0.678*** (0.002)	-0.130 (0.610)	-0.0717 (0.671)
民营化程度		1.063 (0.271)	1.202** (0.026)	1.000** (0.012)
公务员规模			0.704*** (0.000)	0.721*** (0.000)
常数项	15.23*** (0.000)	10.99 (0.203)	12.89** (0.011)	7.952*** (0.000)
N	30	30	30	150
Adj-R ²	0.750	0.804	0.926	0.924

注:(1)括号内数值为 p 统计量,**、*** 分别代表在 5%、1% 的水平显著。(2)由于公务员工资缺乏 2003-2005 年数据,民营化水平缺乏 2011-2013 年数据,因此表 3-5 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在内进行回归的样本实际上为 2006-2010 年的面板数据集。

纵向来看,采用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表 4 中模型(5)和(6)考虑个体异质性分别采用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模型(7)考虑腐败案件可能具有连带效应,采用了动态面板系统 GMM 方法,模型(8)则进一步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并做了相应的内生化处理。总体来说自然资源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相较于 OLS 估计有所降低,但资源禀赋的系数基本显著为正,说明纵向来看资源因素与腐败仍然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但不是造成腐败行为变化的主要因素。而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于反腐败的视角考虑,本文认为:(1)财政分权会显著加剧腐败水平;(2)经济开放度提高有助于抑制腐败;(3)公务员工资水平越高,腐败越少,支持“高薪养廉”理论;(4)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抑制腐败行为;(5)民营化程度与腐败正相关但不显著;(6)与截面 OLS 的回归结果不同,经济越发展,腐败问题也越严重^①;(7)最后,腐败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腐败行为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腐败行为如不加整顿会对政府的治理质量产生极大的破坏。

^①此处并非指降低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减少腐败,只是表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腐败现象应当引起关注。

表 4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RE	FE	GMM	GMM
资源禀赋	0.101 * (0.100)	0.0927 (0.523)	0.208 * (0.094)	0.209 ** (0.046)
经济发展水平	0.307 * (0.063)	0.563 *** (0.004)	0.326 ** (0.049)	0.299 (0.235)
经济开放度	-0.135 ** (0.043)	-0.101 * (0.090)	-0.121 * (0.076)	-0.0699 (0.479)
财政分权	0.540 *** (0.001)	0.317 * (0.077)	0.757 *** (0.001)	0.623 *** (0.001)
公务员工资	-0.403 ** (0.029)	-0.512 ** (0.014)	-0.204 (0.221)	-0.212 (0.368)
教育水平	-0.187 *** (0.003)	-0.158 ** (0.045)	-0.268 *** (0.002)	-0.229 ** (0.027)
民营化程度	0.315 (0.148)	0.213 (0.399)	0.358 (0.458)	0.416 (0.317)
公务员规模	0.755 *** (0.000)	-0.105 (0.727)	0.316 (0.208)	0.299 (0.213)
腐败一期滞后			0.331 * (0.074)	0.388 ** (0.018)
常数项	4.752 *** (0.000)	6.302 *** (0.000)	1.614 (0.205)	1.756 (0.154)
N	155	155	155	155
Adj-R ²		0.162		
Wald chi2	561.17 ***		153.94 ***	123.80 ***

注:括号内数值为 p 统计量,*、**、***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显著。

(二)按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分组回归

Leite 和 Weidmann(1999)在考察资源、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指出自然资源通过引致腐败阻碍了长期经济增长,同时资源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系统所处的初始阶段,具体来说,在经济较不发达的情况下资源增加引起的腐败恶化要比在经济较发达情况下更为严重。为了更细致的研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对资源禀赋与腐败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依据 2003-2013 年各省份平均人均 GDP 排序,将样本分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①,分组进行回归,以考察自然资源对腐败的影响与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得到结果如表 5。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自然资源与腐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无论采用混合 OLS 方法还是动态系统 GMM 模型,自然资源与腐败的关系都不显著,腐败与当地资源经济活动的关系不大。说明总体层面表现出的资源引致腐败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如图 3 所示)。这些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同时也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源,当地采掘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腐败与自然资源禀赋拟合曲线的斜

^①经济较发达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重庆;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率非常大,资源引致的腐败将会严重削弱地方政府的治理质量,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因此成为“资源诅咒”的原因之一。而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腐败与资源拟合曲线的斜率较小,且计量结果表明资源对腐败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法治更健全,体制机制更完善,对资源部门的管理效率更高。总之,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自然资源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质量影响不大。资源通过腐败导致“资源诅咒”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存在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

表 5 分地区回归结果

	经济较不发达地区		经济较发达地区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Pooled_OLS	GMM	Pooled_OLS	GMM
资源禀赋	0.121 * (0.095)	0.184 ** (0.042)	0.0374 (0.424)	0.0790 (0.653)
经济发展水平	-0.435 * (0.064)	0.0243 (0.914)	0.299 (0.432)	0.454 * (0.083)
经济开放度	-0.223 *** (0.000)	-0.188 *** (0.000)	0.196 * (0.064)	0.0194 (0.920)
财政分权	0.967 *** (0.000)	0.572 *** (0.001)	-1.071 *** (0.002)	-0.114 (0.779)
公务员工资	0.426 (0.113)	-0.0157 (0.936)	-0.630 * (0.077)	-0.364 (0.131)
教育水平	0.0483 (0.705)	-0.170 (0.140)	-0.496 (0.107)	-0.462 ** (0.042)
民营化程度	0.427 (0.116)	0.0853 (0.794)	2.161 *** (0.000)	0.960 *** (0.008)
公务员规模	0.737 *** (0.000)	0.676 *** (0.001)	0.648 *** (0.000)	-0.212 (0.618)
腐败一期滞后		0.227 *** (0.005)		0.398 (0.121)
常数项	4.515 ** (0.031)	1.996 (0.105)	7.206 ** (0.012)	3.088 * (0.061)
<i>N</i>	80	80	75	75
Adj- <i>R</i> ²	0.977		0.856	
Wald chi2		441.26 ***		119.60 ***

注:括号内数值为 *p* 统计量,*、**、***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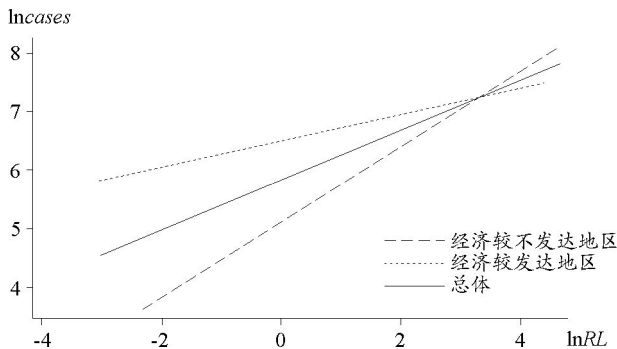


图 3 自然资源与腐败分地区拟合曲线

(三) 自然资源与腐败的关联机制分析

笔者认为,在我国自然资源导致腐败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我国资源部门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制度不清晰,资源所有权、经营权、行政权相混淆,产权纠纷严重。资源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事实上是一种被“内部代理人”架空的概念(邵帅、齐中英,2008),因此给寻租和腐败留下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其二,行政方式配置资源使得官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我国资源部门行政管理机制又存在部门管理权责分工不明确的问题,职能交叉严重。比如一家煤矿企业要取得合法生产资格必须办齐6个证件、经过4个部门,申报材料多、审核时间长、审批环节多,实际上却容易出现多方管理,多方不作为的问题,使得资源开采的审批权沦为某些部门的寻租工具。其三,GDP和财政收入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短期逐利行为,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放松环境、安全、税收、土地和信贷等方面的管制,实际上纵容了无序开采、贱卖资源的行为,严重缺乏资源国家所有的基本理念。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检验自然资源是否通过对地方政府治理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对我国31个省份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无论采用横截面OLS估计方法,还是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均表明资源禀赋变量与腐败变量显著正相关,即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且这一结果对不同的模型显示出较强的稳健性,关键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基本一致。更进一步,本文的分组回归发现这一传导机制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尤为显著,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资源与腐败的关系不显著,政府对资源部门的管理效率较高。遗憾的是本文对于政府治理行为的其他方面,比如政府机构的效率、法律规章的质量等等,由于缺乏相应的度量方法和经验数据,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此本文所考察的“资源诅咒”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实际上局限在腐败这一个层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指出,来自资源采掘业的“租金效应”可能滋生了寻租活动及腐败行为。

从政策层面来说,本文的研究对于破解“资源诅咒”现象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说明,资源开发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高质量的政府管理体系和对资源租金的合理分配与利用。既然自然资源通过滋生腐败,弱化地方政府治理质量阻碍了经济发展,那么减少资源富集地区的腐败行为,提升政府机构的质量就是破解“资源诅咒”的方法之一。首先,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一是对现有产权制度进行优化改革,清晰界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及行政管辖权,避免复杂的产权纠纷问题;二是优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部门的直接干预,加快促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公开、公平、公正”配置资源的作用;三是强化资源国家所有的基本理念,提高资源补偿费率,减少资源产业暴利现象,回归资源全民所有的本质,创新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方式,避免地方政府的短期逐利行为。

其次,基于本文研究所控制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第一,提高地区经济开放度对于抑制腐败有显著效果;第二,我国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地方政府的权责进行规范,同时配合相应的问责机制;第三,明确产权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第四,基于“高薪养廉”理论,提高公务员的绝对工资将有助于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第五,提高公民

教育水平,将显著改善地方政府的腐败现状。最后,考虑到腐败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应该毫不犹豫的加大反腐力度,创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例如可率先在资源富集地区试点开展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让社会公众和媒体参与对官员的监督,提供广泛、有效的公众建言渠道,同时提高举报和监督机制的反腐效果。

参考文献:

- 1.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7:《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资源之咒”吗?》,《世界经济》第9期,第38-46页。
- 2.范子英,2013:《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第179-192页。
- 3.方颖、纪衍、赵扬,2011:《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世界经济》第4期,第144-160页。
- 4.公婷、吴木奎,2012:《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第117-127页。
- 5.胡援成、肖德勇,2007:《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4期,第15-23页。
- 6.倪星、陈珊珊,2013:《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与地区腐败——基于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138-150页。
- 7.聂辉华、张彧、江艇,2014:《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国软科学》第5期,第37-48页。
- 8.邵帅、齐中英,2008:《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第147-160页。
- 9.韦结余,2013:《中国西部地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0.吴一平,2008:《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1045-1060页。
- 11.吴一平、芮萌,2010:《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11期,第10-17页。
- 12.徐康宁、邵军,2006:《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命题的再检验》,《世界经济》第11期,第38-47、96页。
- 13.徐康宁、王剑,2006:《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第78-89页。
- 14.张菲菲、刘刚、沈镭,2007:《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第19-24页。
- 15.周黎安、陶婧,2009:《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第57-69页。
- 16.Ades, A., and R. Di Tella. 1999.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4): 982-993.
- 17.Alexeev, M., and R. Conrad. 2009. “The Elusive Curse of Oi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3): 586-598.
- 18.Aslaksen, S. 2010. “Oil and Democracy: More than a Cross-country Correl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4): 421-431.
- 19.Auty, R.M. 1993.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 20.Auty, R.M. 2001.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1.Barro, R.J., and X. Sala-i-Martin.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2): 223-251.
- 22.Bhattacharyya, S., and R. Hodler. 2010. “Natural Resources, Democracy and Corrup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4(4): 608-621.
- 23.Fisman, R., and R. Gatti. 2012.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U. S. Federal Transfer Programs.” *Public Choice* 113(1): 25-35.
- 24.Frankel, J. A. 2010. “The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A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15836. <http://www.nber.org/papers/w15836>.
- 25.Glaeser, E., and R. Saks. 2006. “Corruption in Ame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6): 1053-1072.
- 26.Gylfason, T. 2001.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45(4):847-859.
27. Isham, J., M. Woolcock, L. Pritchett, and G. Busby. 2005. "The Varieties of Resource Experience: Natural Resource Export 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2):141-174.
28. Krueger, A.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2):291-303.
29. Leite, C., and J. Weidmann. 1999. "Does Mother Nature Corrupt? Natural Resources,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99/85.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1999/wp9985.pdf>.
30. Mauro, P. 1998. "Corrup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Agenda for Further Research."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35(3):10-14.
31. Pendergast, S., J. Clarke, and G. Kooten. 2008. "Corrup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REPA Working Paper. <https://ideas.repec.org/p/rep/wpaper/2008-10.html>.
32. Sala-I-Martin, X., and A. Subramanian. 2012.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2(4):570-615.
33. Serra, D. 2006. "Empirical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A Sensitivity Analysis." *Public Choice* 126(1):225-256.
34. Treisman, D. 2007.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from Ten Years of Cross-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1):211-244.
35. Torvik, R. 2002. "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7(2):455-470.
36. Vicente, P.C. 2010.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West Af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2(1):28-38.

“Resource Curse”, 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Peng Shuang and Zhang Xiao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esource c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weakening, and took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rruption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had led increase in corrup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weakened the qua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by inducing more corruption, thus hindere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resource-rich regions. The regression result by regions showed that this kind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as more obvious in the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regions. By contra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resources was not notable in the economically more developed regions. In terms of policy, reforming the existing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improving the mine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about anti-corruption method, reducing the corrupt behaviors and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were effective ways to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Keywords: Resource Curs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orruption

JEL Classification: Q32, Q38

(责任编辑:赵锐)